

中国历代

流民生活掠影

The Glimpse of Mobile People's Life in Past Dynasties of China

池子华 朱琳 著



沈阳出版社

中 国 历 代

流 民 生 活 掠 影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中国历代流民生活掠影 / 池子华, 朱琳著. —沈阳:
沈阳出版社, 2004. 6

(木鱼石书屋·专题生活掠影)

ISBN 7 - 5441 - 2518 - 1

I 中... II ①池... ②朱... III. 流动人口—研究
—中国 IV. C924. 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52005 号

出版者: 沈阳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 10 号 邮编: 110011)

印刷者: 沈阳市第二市政建设工程公司印刷厂印刷

发行者: 沈阳出版社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 10. 625

字 数: 229 千字

印 数: 1—5000 册

出版时间: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凯 旋 赵 敏

封面设计: 君 华

版式设计: 建 荣

责任校对: 孙 晶

责任监印: 杨 旭

定 价: 17. 80 元

联系电话: 024 - 24809861

邮购热线: 024 - 24124936

E - mail: sysfax_cn@sina.com

前 言

当读者看到这本小书时，首先映入眼帘的该是封面上的那幅《流民图》（局部）。

《流民图》的作者蒋兆和先生（1904—1996），是中国水墨人物画大师、著名美术教育家，是经历那个乱世之秋的“过来人”。20世纪30年代，他南下北上，用“妙手丹青”，把一幕幕目击神伤的《卖小吃的老人》、《卖子图》、《街头叫苦》……的流民形象泼在纸上、印在心中……。1943年9月，经过3年的努力，把印在心中的流民群像——《流民图》，绘在宽2米、长26米的长卷上。画中除了流离中倒毙在途的卧尸外，还有茫无目标的流离群，“牵衣顿足拦道哭”，凄情惨状令人浩叹。这幅《流民图》，就是中国流民生活的一个剪影。

中国是一个流民的国度。自有“流民之母”——农民以来，特别在春秋战国时代确立了农民封建社会生产主体地位之后，就不断孕育着流民，一代又一代，从未绝迹，从古到今形成一条不绝如缕的生态链。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问题。

一幅《流民图》给我们留下太多的思索、困惑：流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他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他们靠什么衣食生存？他们的生活状况与中国社会变迁存在着怎样的互动关系？所有这些，不能不让人萌生穷究的冲动，尽管我们自知心有余而力不足。

解析流民，是“解读”中国历史的一把钥匙。本书希望拂去历史的尘埃，再现历代流民生活的实态。既为“掠影”，当然不可能面面俱到。尽管如此，我们从宏观的描述，到流民“适彼乐土”、城市中的打拼、海外谋生、越轨生活，循序展开，力求给读者以整体感而不至于太过支离破碎。我们用“心”去写，尽可能走近流民，倾听、感悟他们生活的酸甜苦辣。我们也尽可能用清新的笔法，让历史鲜活起来，变得平易近人、更富有人情味。我们努力了，但写得是否到位、“好看”，实在没有什么把握，只好请读者评判了。

本书由我和朱琳博士生“平分秋色”，合力完成，由我最后修改定稿。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本人的《中国近代流民》、《流民史话》、《中国流民史·近代卷》、《流民问题与社会控制》，同时吸收了学界同仁富有创见的研究成果，这是我们要特别感谢的。本书的图片来源，除解放前出版的报刊外，有一部分采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上海图书馆编《老上海——已逝去的时光》（江苏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山东画报出版社编《漫画中的历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版）、叶孝慎编著《上海旧影·移民世界》（上海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文波主编《旧社会·民生》（羊城晚报出版社2000年版）、刘志琴主编《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龚书铎总主编《中国社会通史》（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三联书店1957年版）等，谨此鸣谢。责任编辑王凯旋先生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劳动，特在此一并致谢。

池子华

2004年5月8日于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目 录

前言	1
“流民”种种	1
流民的国度	9
哀哉流民	19
“流民何处是乐土”	27
泥土芬芳	35
“板屋几土著，结棚满山梁”	45
“江西填湖广”	55
“湖广填四川”	63
“死逼梁山下关东”	71
“走西口”的流民	84
“江南行”	94
排斥与磨合	101
“相煎何太急”	114
“向心”运动的流民	121
“孔雀东南飞”	132
“打工”的流民	141
“跑东洋”	150

“打工妹”的理想	160
流民商贩	171
谋生海外	183
“下南洋”	194
“唐山过台湾”	204
流民的“越轨生活”	214
乞丐王国中的流民	223
凤阳花鼓与“凤阳婆”	234
“青楼”噩梦	243
窃贼与强盗	255
江湖人生	264
贩私盐的流民	274
“当兵吃粮”	282
绿林生活	290
寻求“帮”助	300
“王法难犯，饥饿难当”	309
“造反”	319
尾声：生活的曙光	330

“流民”种种

有一首为人熟知的歌唱道：“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流浪……”这几句歌词，用在这本小书的话题——流民上，看来挺合适。

天行不息，人流无常，人口流动原本不值得大惊小怪，可是“流民”却不同，他们是流动人口中一股让人心酸、使人头痛的特殊群体。“流民问题”因此成为困扰中国的一大社会问题，甚至有人说中国历代王朝都毁于流民之手。他们到底是怎样一群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应该“问”个究竟。作为当代人，我们将穿越时间隧道，尽可能走近他们，与读者一道共同体验他们的“生活”。

在进入正题之前，首先应该弄清什么是“流民”。

从字面上讲，“流”是流亡、流浪、流动的意思，“民”却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民”包括士（文人）、农（农民）、工（手工业者及工人）、商（商人），所谓“四民”；狭义的“民”专指面朝黄土背朝天向土里刨食的农民。“流民”之“民”，取其狭义。不言而喻，流动性和“农民”的身份是构成“流民”的两大基本要件。

流民的含义或“从哪里来”？史书中有连篇累牍的记载，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四个方面：

其一，丧失土地无所依归的农民。这是“流民”最原始的意义。

农民是“属土”的，土生土长，土地是他们的安身立命之本。

万物土中生，离土活不成。

田地是活宝，人人少不了。

田地是黄金，有了才松心。

这流传了千百年、发自农民内心的质朴语言，正说明土地在农民心目中的神圣地位。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没有了土地，他们将无以为生。

“土地是财富之母”，也是各种财富的最后归宿。土地诚可贵，地主、官僚、贵族、商人、高利贷者对它更是趋之若鹜，土地兼并迭起狂潮，结果可想而知，“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农民因土地被无情蚕食、吞噬陷入“无地化”的境地。农民丧失土地而“无地化”的过程也是流民不断孕育、产生的过程，史书所说“富者侵占民田，以致贫者流离转徙”（《元史·成宗纪三》），可谓一针见血！土地兼并和流民现象发生的历史渊源，可用以下模式展示：

土地兼并——农民的无地化——流民

土地兼并——农民的无地化——佃农——流民

土地兼并——农民的无地化——半自耕农——流民

土地兼并——农民的无地化——半自耕农——佃农——流民

这几种“模式”，显然比较简单，但却具有直观性，流民孕育的过程昭然若揭，尽收眼底。土地兼并是封建土地所有制

无法割除的一个痼疾，只要土地私有制存在，土地兼并的狂潮就无法遏制，流民也就源源不断地产生。

其二，因天灾人祸而流亡他乡的农民。

民国时期，黄泽苍在《中国天灾问题》一书中说：“西人喻中国之内战为‘秋操’，以其循环不息也。某君则以天灾流行，譬为中国之‘例行故事’。”这“秋操”、“例行故事”，昭示出天灾人祸“莅临”之常。就拿天灾来说，从公元前206年到1936年，这2142年中共发生灾害5150次，平均不到半年就罹灾一次，频率之高，为世界各国所罕见。灾害、饥馑孪生，如影随形，把无数农民推上无可依归的流离之路。

《民国南陵县志》载有《连年荒》诗，可以为证：

连年荒，田庐芜没人流亡。
野无青草室悬磬，酸言苦状难言详。
撮所见闻举一二，已令听者凄肝肠。
吁嗟乎，人生不合居圩乡，水灾酷甚旱与蝗。
衣蔽屋颓水为涸，霜楼露宿家无粮。
大户卖田舍，中户当衣裳，
小户无可卖，鬻女质儿走四方。
一之为甚岂可再，天何不吊连年荒。
呜呼，民何不幸生圩乡？

“流民者，饥民也。”（杨景仁《筹济篇·辑流移》）每逢灾荒，必有规模不等的“走四方”流民潮的涌起，大灾大潮，小灾小潮，潮起潮落，连绵不绝。

人祸主要包括兵灾、匪患、吏治腐败等。中国是一个典型的“战国”，战争频繁，干戈扰攘，殆无宁日。兵凶战危，当

农民不能期待在战火中讨生活时，惟一的出路就是“逃亡”，忍受“失乐园”之痛。杜甫的名诗《无家别》泣诉着：“寂寞天宝后，田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贱子因阵败，归来寻旧蹊。久行见空巷，日瘦气惨凄。但对狐与狸，竖毛怒我啼。四邻何所有，一二老寡妻。宿鸟恋本枝，安辞且穷栖。方春独荷锄，日暮还灌畦。县吏知我至，召令习鼓鼙。虽从本州役，内顾无所携。近行止一身，远去终转迷。家乡既荡尽，远近理亦齐。永痛长病母，五年委沟溪。生我不得力，终身两酸嘶。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诗中描写的残破景象为唐末“安史之乱”所“赐”。战乱中老百姓各奔东西逃难，田园庐舍化作荒野，长满了蒿莱乱草，走兽出没，破败不堪。这就是“兵燹”。中国历史上较大规模的战争就有数百次，每次战争，无不给诗人留下“国破山河在”的咏叹，无不造成数不尽的“无家”者。“匪患”也是如此。至于吏治腐败，也是流民生成的温床，在“苛政猛于虎”的时代背景之下，农民离家远逃避“虎”，司空见惯。

其三，四出求乞的农民。

1904年11月8日（光绪三十年十月初二日）的《时报》报道说：“山左沿河一带，土脉瘠劣，时被水荒，每界冬令，该乡民等动辄结队四出求乞，人多称之为流民。”这类流民很多，历朝历代都有，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说：“无恒产，无恒业，而行乞以图生存之男女，曰丐，世界列邦皆有，而我国为独多。”它与上述各类流民可能有交叉、重叠，因为那些丧失土地、避难他徙或盲目流入都市谋生的农民，若找不到活计，不得不暂时让面子和尊严退居“二线”，求乞以图苟活。

可是，农民乞讨的原因并不简单。在一些经济落后、生存环境不稳定的地方，逃荒积习相沿，已成人的第二天性——“习惯”，荒年如此，丰年也不例外。陈登泰《逃荒民》诗咏道：

有田胡不耕，有宅胡弗居。

甘心弃颜面，踉跄走尘途。

如何齐鲁风，仿佛凤与庐。

其始由兄岁，其渐逮丰年。

岂不乐故土，习惯成自然。



这类“习惯成自然”的乞讨农民，大有人在，清代江苏、安徽淮北地区流民最具典型性，“凤阳花鼓”、“凤阳婆”家喻户晓。乞讨现象的普遍存在，我们也就没有理由不正视“四出求乞，人多称之为流民”的历史规定。

其四，因自然经济解体的推力以及城市近代化的吸力而盲目流入都市谋生的农民，尽管他们可能还保有小块土地。

自然经济是传统中国社会的基本经济形态，它向我们展示的是一幅“男耕女织”（象征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自给自足的鲜艳图画。农民耕地少，可以依靠织布、纺纱来增加收入，勉强度日。但当历史的时针指向近代以后，在西方列强的隆隆枪炮声中，洋纱洋布随之席卷中国，占领中国市场，剪断了耕、织结合的脐带，自然经济逐渐解体。千百万失去“织”业的农民，依赖小块土地生活难以为继，只好麇集都市，找工谋生。同时，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又像磁石般吸引着他们“向心”运动。的确，工业化、城市近代化的推进，给农业劳动者创造了新的就业机遇，流民浪潮于是风起云涌。近代意义的“民工潮”由此而来。一般说来，工业化的高涨时期，正是农民向城市转移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时期。

上述四个方面的流民含义或“从哪里来”，其中第四个方面使流民具有了“近代”色彩。这也意味着随着社会的进步，“流民”自身的内涵也在不断丰富，从而具有一定的时代色彩。如 1989 年以来，经过改革开放，经济获得迅速发展，农村富余劳动力越来越多，加上沿海与内地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所以出现了居高不下的“流民潮”（即民工潮）。新时期的“流民”大致可以定义为：为改善自身境遇在城市和市场经济引力吸附下离土离乡进入城镇从事非农业活动的农民（特别是农村富余劳动力）。就是说，无论“流民”的内涵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但流民的“农民”身份不改。

“流民”与“游民”（游民无产者、流氓无产者），“移民”（迁移人口），“流动人口”最容易混淆，这里附带做些区分，应该不是多余的。

“游民”，按严寄湘所辑《救荒六十策》中所说，是指“平日居民有不农、不商、不工、不庸者”，实际上是混迹于城市与乡村、无固定职业或执“贱业”为生的流动人口。其主要成分有失去土地无以为生的农民，有失去职业的工人，有散兵游勇，有游手好闲之徒等，显然，“流民”与“游民”不能画等号。“游民”为“流民”的一种“流向”。但两者关系密切，“流民”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是“游民”的前身，其转化的条件是“流民”没能寻到营生的门径。由于从“流民”到“游民”之间没有明确的界线，史料和著述中常常混为一谈，如王夫之《读通鉴论·惠帝三》中所谓“以不务农桑、无有定业而为流民（实即游民）”，也是可以理解的。

“移民”，按《中国百科大辞典》及葛剑雄等先生著《简明中国移民史》的解释：从狭义上讲，是指“一定数量人口出于各种目的离开原居住地到另外一个距离较远的地方定居谋生，并不再返回原地居住的人”，或者说是“具有一定数量，一定距离，在迁入地居住了一定时间的迁移人口”。广义的“移民”，泛指暂时或永久性改变定居地的人口迁移流动，“它既包括由各种灾变而引起的流民，也包括国家政府出于政治经济或军事目的而组织的有计划的人口迁移”。就是说，“流民”是广义的“移民”的一种形态，只不过他们应该称为“自发移民”或“无序性移民”。

至于“流动人口”，众说纷纭，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

其一，从行政管理的角度出发，依据是否具有一定的常住户口来确定流动人口，就是说，流动人口指滞留某地但没有常住户口的那部分人口。

其二，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以产业结构为依据，将产业结构转变过程中第一产业中游离出来的未能进入城市正规部门的劳动力视为流动人口。

其三，从纯人口学的角度着眼，以常住地是否改变为惟一标志，将流动人口定义为暂时离开其常住地而非迁居的各种流动人口。

其四，从人口经济学的角度，依据流动人口产生的根本原因来给流动人口下定义，将流动人口理解为不改变常住户口进入某一地区从事社会经济活动的人口。

其五，从人口地理学的角度，将流动人口看成是人口空间迁移变动的一种特殊形式，亦即认为在一定地理区域内发生短暂流动行为的那部分居民。（参见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页）

尽管研究者从各自的研究角度出发，根据流动人口产生的原因、职业、空间位移等不同特征下了不同的定义，但视“流民”为“流动人口”的一种，是没有疑义的。

“流民”及相关概念弄清楚了，那么，我们就可以转入正题了。

流民的国度

中国是一个“流民的国度”，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曾经孕育了多少流民，恐怕谁也无法统计精确，但数十数百数千数万数十万乃至数百万等笼而统之的记载，却不绝于史书。徜徉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摭拾一些“实录”碎片，东鳞西爪，权当“走马观花”的“掠影”，希望能够使读者略见豹斑，有一个“大概”的印象。

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并起，战垒连珠，狼烟滚滚，征伐不已。战乱中，“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农民背井离乡，流离于途，苦不堪言。

秦朝时期，秦始皇穷兵黩武，弄得兵连祸结，天下大乱。战火烧焦了土地，农民不得不“逃秦”而去，陶潜的千古绝笔《桃花源记》，就描写了农民为“避秦时乱”而渴望置身“世外”的强烈愿望，加上秦朝滥征力役，诛求不已，民怨沸腾，“亡逃山林”者比比皆是。

汉代，贫无立锥之地的农民，为生存，亡逃他乡，汉武帝时，竟至“户口减半”。哀帝时，《汉书·孔光传》说：“比岁不登，天下空虚，百姓饥馑，父子分散，流离道路，以十万数。”东汉末年，受黄巾起义以及董卓之乱的影响，“百姓流离”，仅关中地区就有数十万流民逃离家园。

三国时期，群雄割据，战乱频仍，为逃避天灾人祸，大量农民流亡。官方人口统计，魏、蜀、吴三国人口合计为 868 万人，同东汉时期官方登录的最高人口数字 156 年（桓帝永寿二年）的 5006 万人相比，锐减了 85%。人口下降幅度如此之大，主要是众多流民脱离了政府的户籍控制，造成了官方人口统计上的缺漏。流民问题之严重，不难想见。

两晋时期，流民浪潮席卷全国，各地区流民人口动辄以万户甚至十几万户计，常常是“城邑皆空，野无烟火。”《历史研究》1991 年第 2 期所载曹文柱先生《两晋之际流民问题的综合考察》文，参照《晋书·地理志》关于州郡户口数的记载推算，当时从秦、雍地区流出的民户，约占原地人户总额的三分之一；从并州迁至冀豫等州的流民，则占原地人户总额的三分之二；从梁、益两州流出者高达 20 万户，竟占原地人户总额的十分之九。见于记载的两晋之际的流民将近 30 万户，150 万口，约占全国总户数（249 万户）的八分之一。规模之大，令人乍舌。

南北朝时期，朝代更迭频繁，军阀混战，天灾并行，农民“离乡去土”，蔚成大潮，以致“天下户口，几亡其半”，（《南史·郭祖深传》）据杨子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统计，仅南下至巴蜀和长江中下游一带的流民就有 90 余万人。

隋朝，炀帝大兴土木，苛征暴敛，“人愁不堪，离弃室宇”，流民潮又起，仅楚州地区，就有数十万农民流离失所。加上发动对高丽的不义之战，“兴军不息，百役繁兴”，弄得“行者不归，居者失业”，流民遍野，天下大乱。

唐代，“逃户”、“流庸”，几遍宇内，按《唐会要·逃